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 主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主 编
田 昌 五 石 兴 邦

文 物 出 版 社

1175034

责任编辑：楼宇栋

封面设计：张希广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主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中国工运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28.5 插页：4

ISBN7-5010-0137-5/K·50

（平）17.00元

ISBN7-5010-0264-9/K·95

定价：

（精）28.00元

目 录

怀念尹达 学习尹达 继承尹达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	(1)
尹达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贡献	严文明	(13)
古人类学上的难解问题	贾兰坡	(22)
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	吴新智	(27)
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和意义	吕遵谔	(35)
中国新石器时代种族人类学研究	韩康信	(40)
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	高 炜	(56)
农业起源的研究与环境考古学	黄其煦	(69)
关于客省庄文化的若干问题	巩启明	(79)
论常山下层文化	胡谦盈	(91)
试论马厂类型墓葬的几个问题	袁 靖	(109)
中原地区原始文化的几个问题	赵芝荃 吴加安	(135)
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王震中	(153)
北辛文化	吴汝祚	(175)
汉江流域是中国原始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	魏京武	(190)
湖南发现前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中期遗存	金则恭	(199)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学编年	曾 骐 蒋乐平	(207)

马桥文化的源流	李伯谦	(222)
论蔚县周以前的古代遗存	张忠培	(229)
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		
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	石兴邦	(234)
论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	曲英杰	(267)
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	周 星	(281)
黄河上游原始文化居住建筑略说	谢端琚 赵 信	(297)
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	王仁湘	(320)
大汶口文化的葬俗	高广仁	(334)
中国新石器时代复合工具的研究		
——为纪念尹达先生诞辰八十周年而作	佟柱臣	(345)
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所出几件陶鬲的分析	刘观民	(371)
试释几种石器的用途		
——民族考古学研究之一例	汪宁生	(378)
河姆渡遗址出土蝶形器的研究	宋兆麟	(391)
大溪文化的制陶工艺	李文杰 黄素英	(400)
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陶片的初步研究	李敏生 黄素英 武亦文	(428)
尹达的生平和著述年表	翟清福 编	(441)
编后记		(447)

PAPERS ON PRIMITIVE CULTURES OF CHINA

—To the 80th Birthday of Yin Da

Contents

Tian Changwu and Shi Xingbang,	
Thoughts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Yin Da.....	(1)
Yan Wenming,	
Yin Da's Contribution to the N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13)
Jia Lanpo,	
On Difficult problems in palaeanthropology.....	(22)
Wu Xinzhi,	
O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arly Man in China.....	(27)
Lu Zun'e,	
Discove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Fossils at	
Jinniushan.....	(35)
Han Kangxin,	
Racial-anthropological Researches into Neolithic China.....	(40)
Gao Wei,	
Taosi,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56)

Huang Qixu,	
Research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69)
Gong Qiming,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Keshengzhuang Culture.....	(79)
Hu Qianying,	
On the Lower Changshan Culture	(91)
Yuan Jing,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Tombs of the Machang	
Type	(109)
Zhao Zhiquan and Wu Jiaan,	
Sev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Primitive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135)
Wang Zhenzhong,	
Unity and Variet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153)
Wu Ruzuo,	
On the Beixin Culture.....	(175)
Wei Jingwu,	
Jiang-Han Valley as an Interflowing Center	
of Primitive Cultures of China.....	(190)
Jin Zegong,	
Discovery of the Pre-Daxi Culture and the Middle	
Phase Complex of the Qujialing Culture in Hunan.....	(199)
Zeng Qi and Jiang Leping,	
An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207)

Li Boqia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qiao Culture.....	(222)
Zhang Zhongpei,	
On the Pre-Zhou Ancient Remains in Weixian County.....	(229)
Shi Xingbang,	
Bird Cult and Bird Motifs in the primitive Cultures	
of Eastern Coast China and Southeastern China.....	(234)
Qu Yingjie,	
On the City Sites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Period.....	(267)
Zou Xing,	
Primitive Dwelling Types of the Huanghe River	
Valley and Their Development.....	(281)
Xie Duanju and Zhao Xin,	
An Outline of the Primitive Dwelling Building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uanghe River.....	(297)
Wang Renxiang,	
On the Direction of Tombs in Neolithic China.....	(320)
Gao Guangren,	
On the Burial Customs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334)
Tong Zhuchen,	
On the Compound Tools of Neolithic China.....	(345)
Liu Guamin,	
Analysis of Several Pottery Li-Tripod from Zabaikal'e.....	(371)
Wang Ningsheng,	
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Functions of Several	
Stone Tools.....	(378)
Song Zhaolin,	

Study of Butterfly-Shaped Artifacts from Hemudu.....	(391)
Li Wenjie and Hung Suying,	
Pottery-making Techniques of the Daxi Culture.....	(400)
Li Minsheng and Others,	
Examination of the Potsherds from the Neolithic	
Site at Guanmiaosh in Zhijiang, Hubei.....	(428)
Zhai Qingfu,	
A Biography and a List of Writings of Yin Da.....	(441)
Editors's Note.....	(447)

怀念尹达 学习尹达 继承尹达

——纪念尹达八十诞辰

田昌五 石兴邦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尹达是一个看起来平凡而实际上不可磨灭的人物。按照古人的说法，人生可以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尹达没有轰轰烈烈的功业，没有惊人的长篇巨著，做的是平凡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为什么他的形象能长期留在下一代人的记忆中，他的业绩能长期发挥作用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谈一下他的生平，看一下他所走过的道路。

尹达，原名刘耀，又名虚谷，字照林，1906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屯集，1983年7月1日卒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他出生后的年代，发生了辛亥革命，但是失败了，北洋军阀占据了统治地位。列强内侵，军阀混战，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尹达的家庭在这种情势下也落下来。就在这时，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点燃起来，照耀着尹达成长的方向。191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同年，尹达开始上小学。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尹达在这一年到汲县第十二中学读书。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准备讨伐北洋军阀。尹达于次年从中学毕业，进入中州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激扬澎湃；“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一场人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尹达象一切热血青年一样，革命思想随之滋长，决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1927年初，北伐军的先锋部队进入河南，尹达休学在家，心向革命，积极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和民主革命的胜利。

岂料，蒋介石中途背叛了革命，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中国又回到了黑暗中。尹达的希望成了泡影。1928年他又到河南大学（原中州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史，在白色恐怖下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了。在学校，尹达接触到嵇文甫先生，从他那里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示。1931年，尹达从一个书摊上买到了一本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读后思想豁然开朗，由此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据他后来回忆，当时这本书对于增强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信心，提高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动向的认识，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尹达，郭沫若的著作从正面给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从1931年起，尹达带着这种思想跨入了考古学的阵地。开始，他以文史学习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加入河南古迹研究会，参加殷墟发掘工作。次年在大学毕业后，他即成为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助理员，继续进行发掘。1933年，他又考取该所研究生，边学习边工作；1937年毕业后为该所助理研究员。从表面上看，尹达这段经历很平凡，不外乎发掘和学习。但由于他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在破除安特生的新石器时代体系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把我国史前社会的面貌逐步再现出来。这就是尹达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考古学家的地方。郭沫若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步郭沫若之后，尹达在考古学领域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的考古学走向正确的轨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达感到国难当头，再也不能坐在书斋中和陶片打交道了。他心急如火，两城镇发掘报告未写结语就交付给梁思永先生，自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想从那里走上前线和敌人决一死战。尹达于是年底到达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接着又到马列学院学习，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要赴前线杀敌的愿望并未实现。党先安排他到陕公分校任教；继而调任他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参加《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同时兼任陕北公学院总校教员。1941年，他又被调去搞出版工作，直到1946年。整个抗日战争的岁月，尹达的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平凡之中却包含着不平凡。因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此，全党就要学习理论，学习历史，学习现状，而尹达所作的每一项工作，都与此有关。他不仅认真地完成了党所分配的工作任务，而且撰写了不少历史论文，还编了《书籍版式汇编》。

1946年5月，他被调到北方大学任教，并任图书馆馆长。1948年7月，他被任命为华北大学教务处长，直到解放以后。华北大学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他任研究部副部长，有一个时期兼任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近代史。1953年，他又被调到北京大学任副教务长。整整八年多，尹达都做着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他的学生遍布四面八方和各个部门，他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

随着过渡时期的胜利结束，尹达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1954年后，他先后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成员、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红旗》杂志编委；参与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组织并主持过多种学术课题和项目，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尹达还多次出国访问，同国外学者交换意见，建立了友谊。

“文革”结束后，尹达“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虽年老多病，仍力争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做贡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惜天夺之年，中道殒逝，他再也不能带领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上长征了。

尹达一生革命，革命一生。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永垂不朽！

尹达是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参加了由前中央研究院、河南古迹研究会组织的一系列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如31年参加有名的后岗发掘，1932年至1935年参加浚县辛村和大赆店的发掘，1933年调查发掘了安阳同乐寨遗址，1934年至1935年参加发掘安阳西北岗殷王陵墓，1936年参加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等等。开始，他是在李济和梁思永先生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但很快他就成了田野考古的一员主将，能独立地主持发掘工作了。由他主持发掘的安阳西北岗（1001号）亚字形大墓，就是最好的证明。

更可贵的是，尹达在坚实的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解决了安特生未能解决的问题，打开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科学大门，把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是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的。1920年，他发现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次年进行了发掘，收获不小。但由于他是地质学家而非考古学家，用的方法也是、而且只能是地质学方法，这样就打乱了当地考古文化的层位关系。仰韶村遗址包涵有仰韶文化和后于它的中原龙山文化，安特生把二者弄混了，得出了混合文化说。加之，他认为单色陶器早于着色（彩色）陶器，进而颠倒了这两种文化的关系。随后，他到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更典型而且比例很大，于是得出中国远古文化西来说。安特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发创之功，但他的分析和结论多半是错误的。最早明确指出安特生之错误的不是别人，正是尹达和梁思永。

尹达和梁思永在发掘安阳后岗遗址时，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是重大的突破。首先，他们不是按地质学的地层关系，而是按考古文化的地层关系进行发掘的。这就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工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石。其次，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由西向东发展，一个由东向西发展，在黄河中游发生冲突和交错的两种文化；而是一脉相承的。即：中原龙山文化继承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其后为殷墟小屯文化。按后岗的发掘来说，一期为仰韶文化，二期属中原龙山文化，三期乃小屯文化。这中间虽有缺环，但在基本点上解决了中国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问题。因此，说尹达在这时已初步摸清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体系，是不为过的。

1936年，安特生再次来华，尹达和梁思永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安特生当年发掘的并不止仰韶村遗址，对附近的一些原始文化遗址也进行过发掘。其中有的如不召寨遗址，

是单纯的中原龙山文化，安特生没有识别出来，而由尹达和梁思永先生识别出来了。安特生回国后重新检查了自己当年的工作，仍没有发现错误，但他表示尊重中国考古学者的意见，不一定非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可。

1937年，尹达总结了当时已有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写成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文中就二十六处遗址，从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了几点重要的结论。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而豫北后岗等地的发掘资料表明：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二、仰韶村遗址含有上述两种文化遗存，因而安特生说的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有的只是龙山文化；三、安特生以“单色”陶早于“着色”陶为标准编排了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序列，而他说的齐家坪遗址出土的陶器实与不召寨遗址的陶器和仰韶村遗址的龙山式陶器近似，所以他把齐家坪遗址列入仰韶文化是不对的，他所编排的甘肃地区原始文化序列也是可疑的。彻底纠正安特生编制的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序列的错误是解放后的事，但尹达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并由此怀疑安特生的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序列，可以看出他的远见卓识。尹达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仰韶文化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文化又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尹达到延安后仍然坚持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1939年冬，他综合已有的考古资料，写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这篇文章完全突破了安特生的体系，并试图“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比较可信的体系”。它代表着当时新石器时代研究的最高水平，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拓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尹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余年中，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更深入的研究自然无从谈起。建国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尹达又重新走上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阵地。他不仅就一些专题撰写文章，发表意见，如《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等等；而且先后写了不少总结性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开展考古工作和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建议，引导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如1954年相继发表的《关于开展考古工作的建议》、《四年来中国考古工作中的新收获》、《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1962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等。

尹达撰写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章，大都收入了《新石器时代》一书。从中可以看出，尹达对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和精神：

首先，尹达十分重视田野发掘工作，发掘的方法要科学化，对所得资料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期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他曾说：“一个真正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家，必须是一个熟练的田野考古学家，充分掌握田野考古的基本技术和科学规格，带着综合研究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去进行调查和发掘，而又充分运用考古技术观察、分析田野考古中所发现的重要现象，以寻求解决问题的论据和钥匙，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综合研究获得真正的科学基础。因此，我们说田野考古是考古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必须熟练地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立足于巩固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不仅是他的经验之谈，而且确属破的之论。研究历史要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新石器时代的问题当然也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而新石器时代的资料是“无字地书”，只能从田野发掘中来。尹达所以能成为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就在于他三十年代从事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延安前夕还在写《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建国后，他曾多次想去田野抓典型遗址的发掘工作，虽始终未能如愿，但他对田野考古是倾注了精力的。直至“文革”以后，他虽年老多病，仍说：“我准备抽出时间，到有关地方去看看那些新发现的遗址，对新出现的问题也作些必要的探讨，再写一本《新石器时代》的《续编》。”

其次，尹达认为，研究新石器时代和其他考古学的问题，不仅要有第一手的科学资料，而且要有系统性的综合资料。为此，就要有计划地进行调查和发掘，抓住典型，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然后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比较和综合，不同考古文化的异同和发展序列就呈现出来了。譬如说，对某一类型的考古文化，“必须选择堆积相当丰富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类型的遗址，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的发掘，仔细观察其地层变化，找到科学的分期根据，摸索出解决分期问题的线索来。根据发掘这类遗址所取得的结果，在它的附近反复试探，寻找比较单纯的早期或晚期同一类型的遗址；然后进行比较，加以论证，就有可能逐步解决某一文化遗存本身的分期问题。”不同的考古文化的关系和年代问题，则要有计划地寻找它们交错地区的遗址，进行发掘和整理。对这样得来的材料，先写出科学的发掘报告，进而作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从考古学的理论的高度，分析考古资料中所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如此反复进行，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我国科学的考古学体系。

第三，尹达一贯强调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明确指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人类历史提供可靠的、生动的实际资料，应该成为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通过实际的考古资料的研究，以了解人类以往的历史。考古遗址的调查、发掘和整理、研究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把遗迹遗物所含蕴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如实地、明白无误地从考古学语言翻译成社会历史语言，从而进一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解决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某些关键性问题贡献力量。”在他看来，从考古学到历史学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田野考古，第二步是对发掘材料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第三步是“把考古学中的术语翻译为历史的社会生活中所习用的语言，使之更加具有人的气氛，生活气

氛和社会气氛；在可靠的科学根据上，把残缺的遗物遗迹复原为完整而生动的社会历史的资料。”当然，要了解人类以往的历史，仅仅靠考古资料是不够的，而且考古资料多属“无字地书”，将之转化为历史资料不是没有困难的。为此，尹达又提倡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解决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同时这也有助于解决考古学中的问题，端正考古学的研究方向。

尹达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始终贯彻了上述精神。他曾说：“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是恢复氏族制度社会面貌的科学基础，它负有严肃的科学任务。”因为，“氏族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阵地之一，是理论斗争中不可缺少的课题。”他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目的就在恢复氏族制社会的面貌。早在1939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中，他就从各方面进行论证，指出昂昂溪文化反映的是一幅“以渔猎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的画图，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则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的标本。次年，他又根据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有关资料，写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不久，他又编成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其第一编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为“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对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当另行别论，但它作为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开创之作，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于奴隶社会一样，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建国以后，尹达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如1954年的《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一文中说：“我国境内这许多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由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在纵横交织着的繁复错综的关系中向前发展着；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如果科学地系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把地下遗存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眉目来；再结合着我国丰富的古代传说和少数民族的现实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这将使我国原始社会的研究获得更大成果。”后来，他又不断地强调这个课题，直到他逝世前为《史前研究》创刊而写的《衷心的愿望》一文中，他还“热切地希望着我们史前考古学者、民族学者、古史学者密切配合，从各个学科的角度，深入探索下去，使祖国有文字以前的社会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于世，这对祖国历史学将是一件重大的贡献，对世界历史也同样是一大贡献。”

尹达倡导的新石器时代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他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中国史稿》中都有所反映。就我们所知，他还准备按照这种精神主编一本《中国原始社会史》。作为他的后继者和学生，应当把他倡导的研究方向作为遗嘱继承下来，为完成他未竟之业而努力。

尹达是一位举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开始考古学研究的同时，就开始了对历史学的研究，以后，这二者在他身上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1931年，当他开始从事田野考古的前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了。他读了之后深受启发，写了《关于社会分期问题》一文。由此，他认清了考古研究的方向，力图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论证中国的原始社会，这也形成了他结合考古学研究历史科学的独特的风格。

在延安的年代里，他除了根据自己积累的考古资料写的有关新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的论文和专著外，还写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论文。文中发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殷商处于氏族社会的末期，即“处于崩溃中的氏族社会”。孤立起来看，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但尹达是把殷商社会作为原始社会发展中的一环提出问题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探讨这个问题的。因此，这种看法能否成立无损于他对氏族社会的研究，也无损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看来是无可置疑的。

建国以后，尹达的观点有所改变。他承认自己过去对商代后期的社会发展程度估计得“偏低”了。不过，他仍然强调：“必须把这一阶段作为奴隶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复杂错综的社会转化时期，去进行认真的探索。”其所以这样说，在于商代前期的遗迹和遗物尚未被发现，夏代更处于渺茫状态中，更不要说夏代之前了。后来，郑州商城被发现了，他的认识随之前进了一步，殷墟代表着完全形成了的奴隶社会，对他来说已不成问题了。虽然他没有写过专题论文，但在编写《中国史稿》的时候，他欣然把自己发掘过的1001号大墓的材料根据记忆加写进去，这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尹达主张把考古学的术语翻译成社会历史的语言，说明历史问题，但当把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用于历史时，他又持审慎的态度。例如，他对郑州商代前期遗址是肯定的，但对商城持保留态度，认为不妨说是一段夯土墙；到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后，他对郑州商城才最后肯定下来。对于夏文化，当洛达庙遗址被发现的时候，他认为那只能作为一个线索，还要继续做工作。而在二里头文化被发现之后，参以其他类似的发现，他认为那是夏商之际的文化遗存，是可以用来说明夏代社会的。这样，不仅是商代，夏代已进入奴隶社会，在他看来也不成问题了。到了晚年，他进而认为，应当依据夏文化的发现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可惜病魔缠身，他未能亲自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尹达的主要发现是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上限既然逐步在向前提，原始社会自然相应地要向上推。事实上，到他去世为止，中国原始文化的发现已远非三十年代可比了。而他也确有此宏愿，根据业已发现的大量原始文化遗存写一本《新石器时代》的续编，重新谱写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他这一志愿虽未实现，但《中国史稿》的相关部分却多少反映了他后来的认识和观点。

由上可知，尹达对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直到盖棺论定，他的认识始终没有停滞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是极可宝贵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在《中国史稿》的前言中，尹达一再强调，它是一部不成熟的、有待于继续修改的稿本，故名曰：《中国史稿》。这些话就表达了他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在他逝世前夕，《中国史稿》又作了一次大修改，其中原始社会部分修改尤多。虽然他没有来得及看这次修改稿，但如死而有知，他是会赞同这种不断进步的精神的。

尹达在延安时期参加过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工作，撰写了第二编《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到外族的内征》。《中国史稿》的封建社会部分，主编郭沫若嘱他负责处理，而他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重大问题也确实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他为《中国史稿》写的《关于历史理论的处理》、《编写〈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编写体例》以及与此有关的谈话和论文等等，主要内容都涉及到封建社会。他在编写《中国史稿》时所以要特别认真地考虑封建社会部分的问题，是因为原始社会部分有他的《新石器时代》和相关的考古著述可据，奴隶社会部分主要依据郭沫若的著作；而封建社会部分虽可取材于古籍，参考近人的有关著述，但要写出本书的特色来，与全书其他部分协调一致，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当然，尹达只能从指导思想上、理论上和编辑上处理这一课题，不可能对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的各个具体的历史问题逐一进行研究，写成专题论文和专著。正因为有他的指导，全书才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同时他对封建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土地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等的观点，都反映在《中国史稿》的相应部分之中了。可以说，《中国史稿》既是郭沫若留下的遗产，也是尹达留下的遗产。

尹达说过：“郭老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我的严师，我将更进一步地沿着郭老开创的道路，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不懈地努力。”所谓郭沫若开创的道路，并不是指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殷周社会的具体分析和论述，而是指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尹达始终是这样做的。如上述所说，他研究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问题，也研究过封建社会的问题。此外，他还多年讲授过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有所研究。这样，他就具备了研究历史的素质，有能力把上述任务承担起来。